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历程回顾与思考

陈剑敏^{a, b}

(河北大学 a. 历史学院 ;b.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要: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由小到大,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新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迎来发展的春天,但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治学宗旨,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提高史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走出低潮的可行方法,也是其作为主流史学坚持正确导向的必然要求。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历程;回顾;发展

中图分类号:K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917(2014)01-0111-06

20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兴起,并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深入而不断发展壮大。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史学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占据史学主导地位,唯物史观从此成为历史研究的基本指导理论。但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史学并非直线发展,而是呈波浪式演进的总体态势,历经高潮、挫折、回暖、低潮时期。回顾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探索未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发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话题。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回顾

马克思主义史学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主潮,但它的成长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王玉德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大体划分为两大阶段和五个时期。两大阶段是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分界线。五个时期分别是:1930年前,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步传播时期;1930年至1949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步建立时期;1949年至1966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初步繁荣时期;1966年至1976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受到严重摧残时期;1976年至20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

反思深化时期^[1]。笔者认为,从20世纪末至今,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思深化时期。不同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影响也各不相同,反映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曲折。

19世纪末至1930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成长的第一时期。早在19世纪末,伴随着“西学东渐”过程的深入,马克思主义已被当时一些社会精英介绍到中国,如梁启超、马君武、朱执信等都程度不同地提及或宣传过马克思主义,但真正在中国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样也是李大钊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史学基本原理,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1919-1924年,李大钊曾写过一系列宣传唯物史观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1919年)、《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由》(1920年)、《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1920年)、《研究历史的任务》(1923年)、《史学要论》(1924年)等。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等著名学府开设“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等课程,积极向青年学子介绍唯物史观,强调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历史研究。李大钊的这些开拓性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

收稿日期:2013-10-12

基金项目:保定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201301047)

作者简介:陈剑敏(1970-),女,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建。

除李大钊外,这一时期,陈独秀、瞿秋白、蔡和森、李达等中共早期领导人,以及马哲民、陈翰笙等人,也都在介绍和传播唯物史观。1921-1922年,瞿秋白在苏俄考察期间,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部著作,尝试运用唯物史观论述俄国革命史;1924年,蔡和森用唯物史观分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性质和社会意义;李达的《现代社会学》(1926年)、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1929年)、陈翰笙的《人类的历史》(1927年)也都是当时运用唯物史观阐述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典范之作。

通过李大钊等人的努力,到1930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得到了初步传播,日渐引起史学界关注,“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2]。然而,这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毕竟刚刚萌芽,尚处于理论宣传阶段,难以与当时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相提并论。

1930年至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的第二个时期。经过前一时期的酝酿和积累,20世纪3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原理日益为更多人接受,并开始和指导历史研究实践中取得成效。1930年,郭沫若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首次以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为指导,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研究分析,说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适合于中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历史结合起来,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路数。

在郭沫若及其《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带动下,更多的学者开始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历史。吕振羽分别于1934年和1936年出版的《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和《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是继《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历史发展实际有机结合的又两部力作。抗战爆发前夕至1949年,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更是异军突起,在断代史、通史、近代史、历史理论和专史等各个领域都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地位。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十批判书》,吕振羽的《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上册)》,侯外庐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等等,都是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

史学的代表作品,标志着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取得了杰出成就。此外,胡绳、吴泽、华岗等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史家此时也崭露头角。而唯物史观也得到更多人认可。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史家队伍不断壮大,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日渐增多,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唯物史观影响进一步扩大,说明这一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发育成熟,在中国史学界初步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开始引领中国史学新方向。但是,受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的影响,这时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仍未取得统治地位。

1949年至196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的第三个时期。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马克思主义史学从此占据史学主导地位,唯物史观得到全面普及。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史学五大家”——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继续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历史问题,范文澜推出了修订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吕振羽修订出版《简明中国通史》,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他们都自觉修正自己以往研究中的失误,更加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的结合,注重维护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性,为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们的引领下,广大史学工作者和研究者普遍自觉改造自己的思想,努力学习、运用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从事中国历史学教学研究,并积极参与中国历史进程中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中国史学界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

然而,新中国成立后的17年间,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也显现出一些严重问题。当时,尽管有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吴晗等马克思主义史家以身作则,努力提倡和坚持正确的学风,并不断试图纠正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历史研究基本原则的做法,但受当时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还是出现了较明显的教条化、僵化迹象,在表面的繁荣下面已埋藏着的危机。

1966年至1976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的第四个时期。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在史学界出现的教条化错误倾向和政治干涉学术的简单粗暴

做法至此进一步发酵,在一些别有用心野心家和政治小丑的操纵下,唯物史观被曲解为“阶级斗争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已完全背离正确的轨道。吴晗、翦伯赞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家先后受到批判和迫害,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遭到破坏,许多人被迫离开了史学研究岗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遭到巨大的打击。

1976年至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经历的第五个时期,即人们通常所谓的新时期。“文革”结束后,伴随整个国家政治局面的改变,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终于获得新生,重新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始反思过往的一些错误观念,在反思过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也不断得到深化,就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马克思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以及中国古代社会分期及其性质问题、中国近代的“革命”与“现代化”等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再次迎来发展高潮。

遗憾的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苏东剧变,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遭遇低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刚刚兴起的高潮因此又一次退去,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指导地位面临挑战。与此同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在中国传播迅速,从此,在中国史学界,马克思主义史学和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两个流派的争锋和较量持续进行,并且一直延续至今。

二、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挑战

由于受国内国际多重历史与现实因素影响,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面临挑战,正在经历严峻考验。

(一)唯物史观遭受质疑,甚至被一些人否定。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灵魂,它“促进了中国历史学研究方向的转变,使历史研究从描述孤立的、主要是政治事件为主的方面,转向面对社会和经济这一复杂而长期的过程的研究,使史学家认识到需要研究人们的生活物质条件,并重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作用”^[3]。唯物史观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它的传入仿佛是“中国现代史学的临门一脚,催生了现代史学,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系”^[4]。正是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20世纪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在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史学理论等各个领域都留下了杰出的著作,极大地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繁荣发展。

很多史家在治学过程中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唯物史观的影响。著名经学史专家周予同回顾自己年轻时的治学经历时,承认其治经学与史学的目的是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清算封建社会,如同医学家解剖尸体,需要有犀利而合适的解剖刀。我年青时试用过多种解剖刀,也就是中国的和西方的社会历史学说,主要是进化论。但用来用去,还是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才能帮助我们解决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学者们总是纠缠不清的种种问题,指引我们把社会历史的研究变成科学”^[5]。

唯物史观经受住了历史研究实践的考验,成为众多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信仰和追求,也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史家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围绕唯物史观的论战与交锋一直在公开或不公开地进行。1983年金观涛夫妇出版《兴盛与危机》一书,运用“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研究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重大问题作出全新解释,引发了学界围绕唯物史观的一场大规模、大范围争论。在这场争论中,虽然大多数学者和主流观点都坚持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地位不可替代,但唯物史观的地位还是受到影响。此后,新的历史研究模式和观念不断涌现,社会史研究借鉴年鉴学派的新史学方法;受后现代思潮影响,新文化史研究日益兴盛;用现代化史观、全球史观、后现代史观、文明史观等指导历史研究的观念并起。相比之下,唯物史观的处境却有些艰难,甚至有人公开说:“唯物史观派史学已从学坛上的强势者沦为弱势者,正在承受来自民间话语的冷落与排斥”^[6]。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蒋大椿提出传统唯物史观存在着理论缺陷,唯物史观应当被超越,而且必须被超越、可以被超越,“今后如果还以这种唯物史观做指导,可以断定这种马克思主义史学便决难继续保持我国史学主流的地位,而只能沦为一个不大的史学流派”^[7]。蒋大椿的观点再次引发了学者们围绕传统唯物史观的激烈争论,虽然坚持用唯物史观指导中国历史研究仍然是大多数学者坚持的观点,但是这场争论并没有完全打消某些人对传统唯物史观的质疑。目前,坚持唯物史观和质疑甚或是否定唯物史观两种观点的交锋仍在明里暗里进行。

(二)历史研究中存在西化倾向、怀旧倾向,中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及方法流行。20世纪初,西方史学伴随“西学东渐”过程传入中国,曾直接推动

了中国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也推动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的繁荣。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家独大,除苏联史学外,其他西方史学都被挡在了国门之外。1978年之后,一方面是对过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失误的反动,另一方面也是改革开放政策实施和深入的结果,西方史学再次涌入中国。西方“一些重要的史学理论、史学方法、史学流派、史学思潮、重要代表人物,以及一些有影响的西方史学理论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前沿问题,大量介绍到国内来。西方史学引进规模之大,内容之多,范围之广,是近代中国开始接触‘西学’所从来不曾有过的”^[8]。此后,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成为一些学者,尤其是一些中青年学者治史的指导思想和方法,以至于“现在历史学的学位论文、学术论文和专著,动辄引用西方学者(哪怕是二、三流学者)的论点展开论述,不再引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论点,几乎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9]。

在“西方热”高烧不退的同时,20世纪90年代后又刮起了具有怀旧倾向的“国学风”,历史考证法重新受到学界热捧,与此同时,“新历史考证学派”的代表人物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傅斯年等人重新为人们关注。伴随“国学风”的吹起,也出现了所谓摆脱政治、远离政治的论调,认为学术“离政治越远越好”、“离现实越远越好”,甚至重提“为历史而历史”的老调,有人干脆提出“回到傅斯年”。而与“国学热”思潮相适应的是,史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学风重新兴盛,“在史学界大大小小的主流刊物或专业刊物上,几乎是千篇一律的形式化分类或编年史框架的史学论文,对历史的主观释读被挤压到最低的限度,追求客观化、实证化和真实性,成为史学的最高境界。当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正在探索多元的学术话语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却是那样地自信,相信只要手握独家资料,就占有了历史真相本身”^[10]。新时期以来,西方史学思潮和传统国学思潮的升温,使作为主流史学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很大的冲击,其科学性受到部分人的质疑。

(三)历史研究从重视宏观问题,强调研究整体的历史,向研究微观、琐细问题转移,微观史学开始流行。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历史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客观自然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作用,同时受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演变的影响,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会呈现出不同的特

点,因此,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是人们可以认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治学旨趣就是探寻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将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结合起来,实现史学的服务社会功能。因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特征就是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作贯通性考察,注重长时段和重大事变,侧重宏观问题和整体历史的研究。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最突出的成就是关于中国通史的研究、认识和撰述”,因为中国通史“更能全面地阐明中国历史的进程、特点和规律,更能揭示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及世界意义,更能增强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凝聚力和对创造美好的历史前途的信心”^[11]。可以说,注重考察宏观历史,探讨历史的本质及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势和强项所在,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始终坚持和强调的。

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后现代史学思潮的传播和传统实证主义思潮的再次泛起,中青年学者中历史研究选题碎化问题日益突出,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越来越少,专题研究日渐流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微观史研究成为热门。尤以中国近代史研究最为明显,“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研究,已是门可罗雀,多成了‘节日学术’,除了逢五逢十的纪念性会议外,平时学者沟通都难。与此同时,人们对于政治史与理论问题的兴趣减弱,一些学者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具体,越来越小。文化史、社会史的兴起,虽然展拓了近代史研究新的领域,但这种趋向却似乎变得更加明显”^[12]。即使如此,仍有许多学者在为“碎片化”现象辩护,强调“非碎无以立通”,而整体史研究却在事实上被矮化或边缘化。有学者认为无论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也不可能建构完全客观的整体历史,至多是提供了一个稍微大一些的历史碎片而已;如果一定要在整体和“碎片”中间作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13]。尽管也有一些学者呼吁要加强整体史研究,把“总体史眼光”始终作为一种学术自觉,但中国史学界尤其是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现象恐怕不会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走出低潮

进入新时期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面临的问题,既有其自身的原因,即以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

学出现的失误或错误政策的遗留效应,也有来自外部的原因,即苏东剧变后,马克思主义在全球陷入低潮的扩散效应。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走出目前的低潮,一方面应努力修正错误,彻底摆脱过去的阴影,加强自身科学性,既要遵循史学发展一般规律,又要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自身的特点;另一方面,积极应对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挑战,牢牢掌握自己作为主流史学的话语权,引领中国史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一)处理好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勇于承担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关注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史学的基本属性,“和社会生活毫无关系的学问,简直和任何其他形式的自我享乐一样,无权要求得到社会的支持”^[14]。因而,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现实社会无可厚非。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向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传统,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从来就没有脱离近现代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发展现实,从来就不是书斋式的、脱离现实的所谓纯学术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诞生以后,通过对中国历史走向的科学阐述,产生了引导人民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巨大历史作用,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也实现了史学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继续关注社会现实,试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启迪,但这时“我们的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没有充分注意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科学,结果将历史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简单化,片面地强调‘古为今用’,于是,在社会政治出现了问题时,历史学最终成为现实阶级斗争的喉舌”^[15],丧失科学性和独立性,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历程表明,只有恰当处理好历史研究和现实关怀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才能健康发展,也才能更好地为现实社会服务,实现史学的社会价值;反之,不仅自身发展会受到严重影响,也会给现实社会带来恶劣后果。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方面要继续坚持关注现实,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注重研究与社会以及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课题,而不能矫枉过正,走到另一个极端,事实上史学不可能脱离现实而存在,这是由史学的本质决定的;另一方面,也要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史学作为一门科学,首先要遵循自身学术规律,努力追求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任意解释历

史,更不能曲解历史,史学关注现实社会首先应建立在求真的基础上。“史学的独立品格就是求真,即对于历史真实的追求。如果史学一旦失去这种品格,那么史学将不成为史学,在这种情况下对社会的‘关注’,也必将是社会的灾难”^[16]。因此,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反思过往的同时,要自觉承担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历史使命,处理好学术与现实的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这样才能在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的冲击下站稳脚跟。

(二)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的治学宗旨,引领中国史学发展的主航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就是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指导历史研究的一门科学,唯物史观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思想和灵魂。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成长道路可以看出,唯物史观的理论指导和中国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精髓。正是随着唯物史观的传播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并不断壮大,最终取得主流史学地位,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虽然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中国史学曾经出现过不少问题,但那不是唯物史观本身的错误,而是受“左”倾错误思想影响,“或者把唯物史观教条化、简单化,以理论代替学术,或者把唯物史观片面化、绝对化,以原则代替具体研究”^[17],曲解唯物史观带来的结果。当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要摆脱过去失误带来的影响,继续旗帜鲜明地坚持唯物史观在历史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推动中国史学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的成就。因为,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有效的解释历史的方法并未过时,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观点至今仍经常被现代西方史学借用来指导历史研究,如“一、唯物史观把人类历史看做是一个客观的、自然的、有规律的发展过程,这种方法已经成为西方主流史学所采用的基本方法。二、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历史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种基本思路贯穿于英、美主流史学著作之中。三、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中,阶级分析方法是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近现代西方史学家分析历史问题的主要方法之一”^[18]。当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坚持以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治学宗旨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体系。在唯

物史观与具体的历史研究对象相结合的过程中,努力实现理论上的创新和发展,推动唯物史观自身的不断完善;在遵循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时,也并不一定要排斥其他的理论和方法,对那些有益的理论和方法可以吸纳采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同样可以有丰富的内容,充满时代气息。

(三)史学工作者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要有服务时代、服务大局的意识。唐代史学评论家刘知几认为史学家必须兼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清代著名史学评论家章学诚在此基础上又加上了史德的要求,而梁启超更是在“四长”中把史德排在了第一位。重视史德是治史者的必备素养,这一点已成为史界共识。所谓史德不仅要求史学工作者在治史时要“求真”、“求直”,谨慎明辨,尊重客观事实,秉笔直书,而且要求史家要自觉承担社会责任,发挥史学服务现实,“彰往而察来”的社会功能。每个时代的史学家都要践行自己时代的社会责任,脱离时代的历史研究不仅对社会无益,还会阻碍时代的进步发展,终会被时代淘汰。立足时代需要,把握时代脉搏,既是实现史学社会价值的必然要求,也是史学家自我价值实现的必然要求。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能够从小到大,一步步占据中国史学主导地位,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研究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联系在一起,忠实践行了自己的时代责任。

就当前而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时代责任就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为人民大众的福祉,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此,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首先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解决历史问题,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唯物史观,掌握主流史学的话语权,不能让否定唯物史观的非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蔓延。其次,应注意提高素养,尤其是业务素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历史研究有机结合,生产出更多优秀的精神产品,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流地位不是靠政治的强势,不是靠思想上的强迫,主要靠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的学者们自身来努力,通过科学的成果来让人们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19]。再次,应敢于研究和回答一些敏感的问题,旗帜鲜明地回应、纠正、澄清那些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坏影响的错误认识,在一些事关中国历史的重大是非问题上坚持立场,把握正确导向。最后,应心系大局,在

选题和研究中多关注与国家、民族命运关系密切的题目,对社会发展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题目,要有“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气魄,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 [1]王玉德.中国20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回顾与反思[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01,(11):97-106.
- [2]李大钊史学论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149.
- [3][18]左玉河.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的发展[J].河北学刊,2013,(3):46-50.
- [4]薛其林.唯物史观与中国现代史学体系的构建[J].长沙大学学报,2012,(1):79-82.
- [5]周予同.周予同自传[J].晋阳学刊,1981,(1):88-91.
- [6]王学典.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738.
- [7]蒋大椿.当代中国史学思潮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发展[J].历史研究,2001,(4):3-21.
- [8]于沛.坚持历史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方向——学习邓小平“四项基本原则”札记[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05,(1):3-9.
- [9]张海鹏.新时期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求是,2009,(7):44-46.
- [10]许纪霖.没有过去的史学危机[J].读书,1999,(7):64-70.
- [11][16][17]瞿林东.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268-269;34;65.
- [12]郑师渠.近代史研究所谓“碎片化”问题之我见[J].近代史研究,2012,(4):5-10.
- [13]王笛.不必担忧“碎片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J].近代史研究,2012,(4):30-33.
- [14]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49-1960)[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9.
- [15]张剑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
- [19]林甘泉,邹兆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古代历史——访林甘泉研究员[J].历史教学问题,2006,(3):25-39.

责任编辑:黎伟盛